

林語堂研究 叢書

林語堂的理想文化人格

沈金耀◎著

林語堂



中國華僑出版社

林語堂研究 叢書

林語堂的理想文化人格

沈金耀◎

林語堂！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的理想文化人格/ 沈金耀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10

ISBN978-7-80222-470-4/G·368

I. 林… II. 沈… III. 林语堂(1895~1976)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9188 号

● 林语堂的理想文化人格

著 者 / 沈金耀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郭岭松

封面设计 / 鲁 明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50 千

印 刷 / 北京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2-470-4/G·368

定 价 / 27.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福建人才辈出,灿若繁星:严复、辜鸿铭、林琴南、林文庆、林语堂、郑振铎、谢冰心、许地山……这无论以地域涌现的数量,还是从其个人影响在历史上的地位来说,都令人难望项背。

然而,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文化和地域现象,这些福建人的骄傲却远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在民众中形成应有的影响力。严复等人如是,林语堂的遭际也如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20世纪中后期,曾有人这样评价林语堂:“全世界大多数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位是德配天地的孔夫子;一位是学贯中西的林语堂。而事实上‘夫子之道’也多半是经过林语堂先生的彩笔介绍给外国人的。”台湾作家林海音也表示:“本世纪的中国人能成为世界性作家学者,我认为只有林语堂一人。”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为了解中国而读了林语堂的书,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

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然有用。”可以说,林语堂其人、其文在中国,尤其在西方世界,都具有令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力。

林语堂其人,声名远播。褒之者谓之是巨匠大师,贬之者谓之是反动文人,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现象集于一身,这个“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林语堂,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诸多领域,无不涉足,思翔笔飞,幽默谐趣。但其“两脚踏中西文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上、倾向上的对撞冲击,使得天赋加饱学的林氏也自认为“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在走过几十年曲折的历史时空时,我们发现,要认识林语堂,诠释林语堂这个“矛盾”,仍然有着一个很大的研究空间。

林语堂其文,汗牛充栋。他中英文双管齐下,文史哲内容兼备,上下千年、古今中外,小说、传记、散文、论著、译文乃至辞书,无所不及,行云流水,雅俗共赏。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取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大抵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善,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惟断断不肯出卖灵魂,顺口接屁,依傍他人,抄袭补凑,有话便说,无话便停”。为此要解读林语堂一生著作,是一片更为广阔的探索天地。

在新的世纪,和谐与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调。林语堂这位曾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当风正帆悬,可以客观公正地一步一个脚印加以书写了。

林语堂是漳州人,他自称是故乡忠实的儿子,其文章中屡屡表达出对故乡的拳拳情愫。作为林语堂的同乡、后人,感到对林语堂的研究任重途长,悟出应该

为林语堂研究做些什么。故乡人为林语堂修复了故居,建造了纪念馆;漳州市适时成立了林语堂研究会;漳州师范学院成立了“闽台文化研究所林语堂研究中心”,构建专题研究林语堂的平台。我的前辈师长福建省社科院文研所的万平近先生为林语堂研究拓荒,为其做传;漳州师院的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兆胜博士等出版了大量研究林语堂的文章和著作。近些年来,林语堂研究的环境得以改善,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人气也出现上升之势。漳州师院一群学人,继出版了《林语堂研究论文集》之后,现在又要推出这一套《林语堂研究丛书》,从不同角度研究林语堂,抛砖引玉,求其友声。对林语堂的研究,我宥于见闻,孤陋浅见,居于责任,我曾在漳州籍现代三作家(林语堂、许地山、杨骚)的全国研究会上和《林语堂研究论文集》的序言中说过:“只要我们有林语堂与闽南人那坚忍不拔的性格与精神,锲而不舍,不言放弃,就一定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相继会出现林语堂研究的专著,林语堂研究的专家。”我仍旧热切地企盼着!

是为序。

本书试图从文化与文学的角度谈论林语堂。

如何谈论林语堂,对林语堂可能谈论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林语堂已远离我们而去,留下等身的著作,我们更为可能的是在他的著作中追寻林语堂,我们能谈论的也只是他的著作中的林语堂。也许,林语堂的亲友可以在文学文本之外谈论林语堂,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叙述中了解林语堂,但那也是他们记忆中的林语堂,是另一种文本中的林语堂。在记忆中的林语堂,也是经过改写之后的林语堂。我们现在研究林语堂、解读林语堂,只能通过他自己写的文本和别人写的文本来研究林语堂。如果在这里我们对文学做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的话,把比较人性化的文字视为文学,那我们现在能谈论的,是文学文本中的林语堂。

根据他的著作谈论林语堂,可以谈论林语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在这一方面已有不少的著作,如王兆胜的《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等一系列著作,施萍的《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林语堂有极大的帮助。现在我们能在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上谈论林语

堂,正是得益于这些研究者的成果。阅读以上著作时,我发现其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文学文本是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真实表现,于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本去了解一个人,即使这些文本有虚伪之处,我们也可通过去伪存真而知道创作主体的人格本体。这是至今为止深刻影响我们的文学观念。现在如果还依照这样的文学观来谈论林语堂,有王兆胜和施萍的著作在,我们已没有必要再谈林语堂的文化人格了,因为他们似乎把可能说的都说尽了,特别是施萍极为扎实地剖析、阐释了林语堂的文化人格的构成及其意义,做到了如夏中义先生在总序中所说“从百年文论演化谱系出发去陈述‘他是谁’”^①。我们如果要接着谈林语堂的文化人格,不得不换一个角度。我的设想是调整一下我们的文学观念,特别是散文观念,由此得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论林语堂。

林语堂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我倾向于把他的《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等看成是他的大型的思想随笔,或“文化散文”而且是真正的“大文化散文”;将他的《林语堂自传》、《八十自叙》、《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等看成是他的大型自述散文。我的这个研究,主要是以林语堂的这些“大型散文”和一系列的短篇叙事散文为依据的。

在一般的散文观念中,散文是写真实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散文可以虚构,但似乎仍限定在所谓的“艺术散文”或“纯散文”或“文学散文”,而记人叙事的散文则不能虚构,不能失真。因此是否虚构成了散文与小说的一个重要界限,2006年还就这个问题引出了一次国际学术争论。2006年10月,在绍兴举办的“鲁

^① 施萍:《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大村泉提出“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的问题,他说:“在中国,即使是在研究人员当中,人们基本上把《藤野先生》一文看作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基于史实的自传)。但在日本,一向敬仰鲁迅的人,尤其在研究人员当中,大多数人把这个作品看作是一部小说。”^①有中国学者反对这个说法,鲁迅研究专家王吉鹏先生动情地说道:“说《藤野先生》是‘小说’,虚构的,我感情上也通不过。当然,感情不能代表学理。……《藤野先生》所写的藤野先生对青年鲁迅的温暖和关爱,以及鲁迅对这种温暖和关爱的感激和感恩之情是真的,不是虚构的。”^②他们对这个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上,即回忆性散文应该是真实的,虚构的东西是小说不是散文。当然,在这个讨论中,两人所据的“真实”一个是事实的真实,文中叙述与“事实”不符,所以是小说;一个是情感的真实,而与事实不符的叙述只是“记忆的失真”,所以还是散文。在这个争论中隐含一个有关散文文体的理论问题,如果按日本学者的标准,回忆性散文不能失真的话,那几乎所有的回忆性散文可能都只能当作虚构的小说看了,因为他们所依据的事实,也只能是另一种文本的叙述,又以什么标准来确定这个文本是真那个文本是虚构呢。但如果“回忆性散文”不可避免“失真”,那么什么东西失真,失真什么,如何失真,就是大可玩味的了。这个国际争论包含丰富的散文理论意蕴,关于这个散文的理论问题在这里不宜展开,容当另文论述。

① 《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② 王吉鹏:《有关当前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06年10月18日在“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鲁迅研究评论及其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在我看来,“回忆性散文”,不管是述人还是自述,都不能看成是写实的报告,不管是细节还是大事,总会与事实有所出入,因为任何叙述总是选择、摘要、强调的叙述,即使是法律报告也不可能与事实分毫不差的叙述,只能是意向性的叙述,在文学散文中更多的可能是近似真人的理想化叙述。即使在写真人真事的散文中,选择也就意味着取舍,一有取舍也就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倾向,而这个思想情感倾向很可能会使作者写出一些“想当然”的事情来。季羨林先生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记述:“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不但不惶惶,而且在人们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子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满面含笑,做了简短的讲话,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赴南京去了。”季先生生动地记述了胡适先生“含笑辞友朋”的情景,但这篇“回忆性散文”后来还有个后记,说对此事的确实性有点疑惑,记此事的日记又丢了,“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50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①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季先生的学问和诚实,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尚且“回忆是错了”,其他

^① 季羨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载王剑冰主编:《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1998-1999),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169页。

人的回忆性散文的记忆的失真更是不可避免了。问题在于胡适的朋友式的微笑在季先生的印象中太深刻了,这个印象是极其真切的,这个印象同化了季先生记忆中关于胡适先生的材料,以致有如此理想化的记述,即胡适先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保持着朋友式的微笑,胡适先生应该是这样的人,这也是季先生向往的理想人格。

至于自传类的“回忆性散文”,其可靠性就更值得斟酌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不包括有意造假的“回忆性散文”。即使力求写实的自传类散文,失真之处也极为常见。如林语堂关于他二姐的年龄、出嫁时间、与林语堂谈话的情景和内容,在《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自传》、《八十自叙》中就各有差别。然而在这里我们须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这种回忆性散文的“记忆的失真”,即它不是有意的造假、伪饰,而是以一个理想化的人格标准叙述自己、叙述他人,说什么、不说什么,强化什么、弱化什么,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叙述“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自述的文章体现了作者的理想人格。在叙述他人时,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意念也会影响作者对材料的取舍和文章的叙述,也是以一个理想化的人格在写其他人。

散文的求真与失真是一对无法避免的矛盾,导致这一矛盾的因素很多,语言、文体、文化、思维、情感,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将这个矛盾理解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差异。因此,“回忆性散文”不管是述人或自述,总有一个理想化的人格在引领作者的思路。当然在单篇的散文中,有时不容易看出作者理想人格的明确内涵,但在一个作者的大量作品中则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作者的理想人格。

我曾在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作家的散文写得比较多（数量多、角度多、内容广泛），比较成熟，并且真诚，那么在他的散文总体中会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等于作者本人，但往往是作者理想中的人，或所谓理想人格。”^①我现在仍是这么想的，可能有许多人也是这么想的。当我们听林语堂自叙时说他是“一团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的理想人格与现实人生的矛盾。如果根据他的所叙想坐实林语堂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永远理不清楚林语堂这团矛盾，如果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来理解，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这“一团矛盾”的机微。林语堂著作中的林语堂不等于现实中的林语堂，似乎可以说著作中的“林语堂”是作者的理想文化人格。因此本文不是根据他的著作谈论林语堂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谈论林语堂希望成就什么样的文化人格，林语堂倡导什么样的文化人格。林语堂散文中所述更多的是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能全部坐实为林语堂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本书的基本思路。当然，我们谈论林语堂的理想人格，要以林语堂真实的人格作为基础，但这方面王兆胜先生和施萍先生已做了很好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也涉及林语堂文化人格理想的方面，但不是作为立论的重点和基本角度，这才为我们留下可以继续讨论的空间，我们才可以换一个角度，调整一下关于散文的观念，从而在他们的研究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

二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人格，心理、道德、政治、文化等。简单地说，人

^① 沈金耀：《贾平凹的散文艺术》，《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作为个体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和特征即是人格。于是我们可以在心理的层面描述一个人的特质和特征,也可以在道德和政治等层面描述。也许是心理学对人格进行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但也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但这样的一个心理学描述应该还是比较容易被普遍接受的:“人格(personality)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系列动态的、有组织的特征,这些特征独特地影响了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认知、动机和行为。研究者有时也把人格看成是一种心理结构(psychological construct)——一个复杂的抽象概念,包含个体独特的遗传背景(同卵双生子除外)、成长经历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他(她)在不同情境中的反应。”^①这个描述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我们讲文化人格,主要就是在文化的背景中讨论一个人的特质及其特征。这样谈论人格,往往就不只是一个人的特质和特征,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可能有一群人(种族、民族)形成了相近的文化特征,因此文化人格可以是指称某个群体的,可以指称某一群体所具有的“一系列动态的、有组织的特征”,它往往体现为某个群体的共性,如“民族性”、“国民性”之类,不仅是特指某一个个体。当我们用文化人格指称个体的人格时,主要是强调这一个体人格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人类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施萍先生指出:“人类文化与文化人格之间形成了对应关系,正如人类文化一样,文化人格也是由不同的文化元素构成。根据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可以将文化人格分解为信仰人格、理性人格、道德人格、审美人格,它们互相关联,互相

^① (美)里赫曼(Richard M. Ryckman)著,高峰强等译,《人格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作用。”^①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人格的形成既有“遗传背景”又有人的主动选择。因此,在一个人身上的“文化人格”有被动形成的因素,也有自己主动选择形成的因素。同时一个人既有的“文化人格”不一定就是这个人所意愿的,于是个体也可能在文学著作中表达自己所希望成就的文化人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想文化人格了。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所阐述的理想文化人格,会不知不觉中引导一群人的文化取向,成为影响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文化人格形成的因素。而许多的作家、学者、思想家对一个民族的共性的叙述或想象,也就描述了这个民族的理想文化人格,它可能是在这个文化中的个体文化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基本范式。而且这种经一个民族精英描述的理想文化人格也可能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取向。

某种思想观念、社会构想对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林语堂是深有体会的。他说孔子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在一切历史中最成功的社会哲学家,“他有一个社会秩序的梦想,而这个社会秩序为中国人民接受了差不多两千五百多年,对他们的礼貌、风俗、家庭生活、社会习惯,及宗教崇拜,都有影响”。^②这里所说的孔子的“社会秩序梦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想文化人格,也即是其中包含的从社会文化出发对人的塑造。孔子的理想在生前无法实现,但在身后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这就是权威的理想文化人格对人的影响。在这种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历代的圣贤也会根据他们的理想文化人格遴选出一些杰出

① 施萍:《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当然我所说的文化人格的构成与施萍先生所说有所不同。

②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谢绮霞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人物,成为某种理想文化人格的典范。芸芸众生也就以此作为模仿的榜样,由此造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性,同时在这些理想化的人物身上达成民族文化的认同。所以探讨一个时代的理想文化人格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当下有一些人总以“科学”、“真实”的理由对民族历史文化名人进行严格审查,挑出这些文化名人的缺失,或指出现有的描述与史实不符,这实际上是忽视了历史文化名人的历史构成,忽视在这种历史构成中,在一个民族对文化名人的叙述史中融进的民族文化的理想因素。文化名人已成为一种象征,是民族理想文化人格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形象化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文化发展的同一或多元并存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对全球化的同一趋势,各民族的反应往往是更为强调民族的文化特征,拒绝被同化。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以求明确“我们是谁”,然而现实也告诉我们,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也逼着我们思考“我们将是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在某种强势的胁迫下被同化,使全球化成为某种文化的同一化,而坚持文化的多元化,或在文化融合进程中要求我们的文化应具有的地位和作用,那么我们除了要弄清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在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坚持哪一种文化人格,这就涉及到理想文化人格的问题了。林语堂说过:“我最关心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①从这里我们有理由说林语堂的大量著述是关于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的,他之所述是生命应有什么样的

①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谢绮霞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理想状态,人的品性是什么,应该如何完成人的品性,近于我这里所说的理想文化人格。谈论林语堂的理想文化人格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林语堂的直率、多产,他关于中国文化及他自己的热情描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本材料,这些文本体现了林语堂文化人格的发展历程。“孔子相信没有人格变革的社会改革是表面的。”“沉默革命的教义是社会改革,以个人的改革及教育、自我的修身为基础,是孔子的首要企图。”^①林语堂如此论述孔子,也可以看成是林语堂的夫子自道,他对理想文化人格的追求可以说也是意在社会的改革。林语堂是在中西文化的穿越中完成他的人格发展的,也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理想人格。今天,我们面临多元文化的互渗,中国人又面临一次在不同文化的交织中发展人格的问题,尽管我们面临的中西文化与林语堂所面临的中西文化已有很大不同,但林语堂的经验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由于林语堂的特殊经历和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崇高地位,探讨他的理想文化人格有着极大的意义。他是一个“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巨人,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体会,对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成为什么样的人有许多中肯的见解,因此他的观念、他的理想文化人格对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也具有非同寻常的参考价值。因此,他阐述的理想文化人格对我们现今的社会发展、文化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

理想文化人格,即人在信仰、道德、文学艺术、社交、言默行止、饮食等方面所

^①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谢绮霞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希望形成的“一系列动态的、有组织的”特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个人在这些方面原已形成的特征是想象、设计理想文化人格的基础,一个自觉的人往往是在检讨自身既成文化人格的基础上提出理想文化人格。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可以说是系统地体现了林语堂的理想文化人格。他说过:“吾父与我同样都是过于理想的人,因为我父子俩都欣赏幽默和同具不可救药的乐观。”^①这么一个过于理想的人,在他的书中也可以尽情抒写他的理想。《吾国与吾民》的《自序》说:“在这一本书里头,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育着太复杂的内质,欲加以阐述,势难免于牴牾歧异之见解。任何人苟有持相反之论旨者,鄙人准备随时供给可能的材料以便利之。”“我这一本书是写给淳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看的,忠恕之道为古代中国之特长,今则已成绝响,我的这一本书,只受知于这样纯朴的观点。我所说的话,是只说向那些尚未丧失人类基本德性的人们,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我。”^②这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特征的介绍做了价值化的处理,而不是所谓严格的学术性的客观介绍。在他的介绍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出与事实“不符”之处,但任何历史都是一种叙述,如何叙述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取向,林语堂率直的大胆取舍正表明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特征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这里也就体现了他的理想文化人格。如他所说“忠恕之道为古代中国之特长,今则已成绝响”,这里也包含着恢复忠恕之道的旨向。又如批评中国人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之后接着说:“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

①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工爻、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②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